

在场主义文学研究·周闻道主持

在场是新大众文艺的本质特征

“新大众文艺”成为当下文艺的一个热点,似乎并不难理解。

这要从概念的内涵逻辑去解读。所谓“新大众文艺”,其内涵大致由“文艺+大众+新”构成,其内涵的每一次丰富,都是时代的进步对文艺演进的催生,或者说文艺“面向事物本身”的必然结果。

“新大众文艺”整个概念的基础和核心词是“文艺”。文艺,文学艺术是也,其生产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形式;功能是以语言、形象、声音、形体等为载体,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创造审美价值,并以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影视、舞蹈、曲艺等形式表现出来。说得直白点,其不是油盐酱醋茶,也不是生活之必需。因此,文艺一开始就是人类在满足生存或生活必需后的精神需求,基因里就带着贵族化倾向,文学更是如此,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这样。这里,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文学与大众结缘,是“五四”的产物。1919年,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提倡的平民文学,形成了大众文艺最早的思想根源。他们主张文艺应当摒弃贵族化,面向普罗民众;后来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蒋光慈、钱杏邨等太阳社作家与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提出了文艺为大众、面向工农群众的主张;1930年左联成立,全面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标志着近代大众文艺思想的正式确立。

追根溯源,文学与大众结缘,有其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是时代语境驱动的产物。所谓语境,乃是人类语言的环境,即什么人,在什么场景,说什么话,有其内在的必然;文学乃语言艺术,自然与说话有不可分割的血缘,散文就缘于说话。到了中国近代末期,当一代进步青年吸收了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千年的封建礼教受到强烈冲击,随着社会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过去贵族化的文学面临新的语境。当普罗大众成为文艺的消费者、创作者、传播者,文艺不再是象牙塔里少数精英贵族的专属时,其改变成为必然。当文艺走出贵族城堡,其便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其次,它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民大众始终是社会进步的主体,事实上,当传统文学陷入精英化、小众化,脱离大众的时候,其就对自身的前进造成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并从中获得动能。

最后,它是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其中,除了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为物质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精神层面的;而文学,就是人类精神需求的重要方面。这就注定了大众向文学的奔赴。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其根基在社会生活中;而人民大众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作家创作的源泉地,对文学无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这就注定了文学向大众奔赴的必然性。

当我们认识了文学与大众结缘的必然性之后,另一个必然性也就难以回避地呈现

在我们面前了:在场。因为作为“存在意义的显现”的在场,本身的基础就是“存在”,无论时代语境也好、文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也好,还是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也好,都是时代的客观存在;在场的价值指向在于,有效呈现这些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前面的论述主要阐释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那么,“新”和“在场”则是贯穿于它们始终的源头活水,从五四新文学到大众文学再到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新”,主要包括时序和内涵。

时间不居,时代的发展是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与“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在场并交织,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永续生命力。

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是以语言的通俗化(白话)为发轫的。白话文的兴起不仅冲破了文学贵族化,还以大众通俗易懂的白话式表现形式,打通了文学走向大众的语言通道。当白话表达达到一定程度,思想和内涵的大众化,似乎就成了文学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场主义强调“面向事物本身”,在场即立足现实、直面当下、介入生活。从大众文学的产生、流变、思想根源和内涵生成就可以看出,它本身就是在场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按此逻辑,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学与时代在场的客观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的在场,打通了文学与现实、作家与大众的壁垒,是文学重获生命力、延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论似乎顺理成章:置身新时代,文学如果不在场,就不可能“新”;如果不面向大众,成为“大众文学”,也不可能在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属于文学史上最大的以地缘命名的文艺思潮,波及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现象。但是,目前高校最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对中国西部文学的整体地位、作家身份认同和作品评析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在场”。本期本栏刊发李震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不在场”现象——20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的缺席》,以史实为理据,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表达了对20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的“在场”呼唤。薛平与龙其林教授的《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在场书写研究》,将科学视角与诗性象征相融合,对杨文丰先生倡导的“大生态散文在场写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文本考证,可供有兴趣者参考。

“西部文学”拥有新大众文艺的天然基因,“大生态散文”也关系到大众的生态忧虑、生态觉醒、生态干预和生态书写。无疑,它们既是在场书写不可或缺的文类场域,本身也是在场写作的重要呈现。